

老照片

第四辑



“夺权”斗争亲历记
黑龙江 1969 罗以民
百姓人家 胡静
秋瑾就义前后事
圆明园遗影 史建
“文革”中上学
一张照片的是是非非
皇帝梓宫出殡



封面人物 严复



清末官吏

本世纪初摄于烟台

目 录

马大正	“夺权”斗争亲历记	1
罗以民	黑龙江 1969	7
胡 静	百姓人家	15
王传宏	寂静的心跳	17
孙 珉	外交官·诗人	19
叶芳骐	严复、叶祖珪、萨镇冰三位的交谊	25
王建民	秋瑾就义前后事	30
史 建	圆明园遗影	33
郑 岩	丹尼尔“鲜汁”及玉函山造像	42
王世龙	一张照片的是是非非	47
董 时	尼古拉教堂被毁纪实	50
李梅彬	护送李达经香港去北平	55
谢 泳	一个人和一本周刊	60
王旭东	我为周总理带路	62
朱 邈	庐山上的人与事	63
苗淑菊	仅存的父亲的几张照片	65
唐宁平	一张照片与一把调羹	70
罗维扬	黑白人生	73
史耀增	在宣传雷锋的日子里	78
高冠农	“文革”中上学	81
武立金	异域祭英魂	84
胡昌健	法国乔治·拉比博物馆收藏的几幅中国	

	历史照片	86
钱宗灏	记录国耻的相册	91
姜 波	济南旧影	95
屈春海	光绪皇帝梓宫出殡	100
邵盈午	南社雅集	105
孙 洵	扬州名士吉亮工	110
弘 石	中国第一位女电影演员	112
马起来	魂断巴黎的王守义	114
刘 敏	梁桂华的故事	117
杨秀利	人性的暴虐	121
孙永康	准确地诠释历史照片	122
江修惠	一点补正	124
冯克力	照片的独立话语	126

征 稿

《老照片》是一种陆续出版的丛书，计划每年出版四至五辑。专门刊发有意思的老照片和相关的文章，观照百多年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对稿件的要求：所提供的照片需是 20 年以前拍摄的，且有一定的清晰度，一幅或若干幅照片介绍某个事件、某个人物、某种风物或某种时尚。文章围绕照片撰写，体裁不拘，传记、散文、随笔、考据、说明均可。

本编辑部对投寄来的照片稿件，无论刊用与否，都精心保管并严格实行退稿。稿件一经刊用，即致稿酬。

来稿请寄：山东省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编辑部

邮编：250001 电话：(0531) 2010055 转 5407

邮购办法：请汇书款（每本书加付 1 元邮资）至上述地址，并注明所购书目。

·旧事重温·

“夺权”斗争亲历记

——贵州农村“四清”小记之一

马大正

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不会忘记“夺权”这个响亮的口号。所谓夺权，乃是“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之意也。不过，本篇短文记述的则是“文革”开始前二年，我所亲历的发生在贵州偏僻小村中一场“夺权”斗争的片断。

33年前的1964年，在大学念了8年书的我，终于离开了母校山东大学，步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设在北京建国门大街的哲学社会科学部是当时社会科学研究“最高殿堂”，社会上这么认为的，我们这些“入了部”的人更是这么感觉的。从1964年秋天到次年夏天，在统一部署下，民族研究所上到所长、下至普通研究人员，人数达数十人，统统奔赴贵州省，在晴隆县鸡场区雨集公社参加一期“四



鸟瞰山坳中的雨集村（马大正 摄于1965年6月）



雨集大队群众诉苦斗争大会主席台（马大正 摄于1965年1月3日）

“清”运动，我被分配到该公社雨集大队的雨集生产队，当上一名“四清”工作队队员。

从进村、“扎根”、建贫协、夺权、评审四类分子，进而发展生产，重建党支部，

巩固社会主义阵地，直到“斗人”的群众（谓之革命动力）和“挨斗”的群众（谓之革命对象）都含着热泪相送组织他们互相“斗”的工作队出村，“四清”运动在雨集村的全过程我都参加了，从进村时的队员，到出村前忝入小队长之列（属“九品”吧），按当时的标准，属表现尚可者。“四清”运动的各个环节中，夺权和评审是属于对敌斗争范畴，最富于火药味。我从自己的相册中翻拣出几幅老照片，正是这一历史场景的某些片断。正好手头还保存有一份当年我曾参与起草、纸质已泛黄变脆的《雨集夺权斗争的第一仗（夺权斗争大会简报）》，两相参照，重睹、重读，让人回忆，让人深思。

雨集村在晴隆县西南深山之中，这里山峦起伏，流泉淙淙，绿树修竹，青翠掩映。不通公路，仅有羊肠山道相通，由村到鸡场区要翻越三座大山，步行往返快走也得4个小时。雨集村是个民族杂居村落，居住着布依族、彝族、汉族3个民族，共221



斗争大会上挨斗的罗德明（台前低头者）。台下第一排穿旧军服戴眼镜者为本文作者。

人。在当时，雨集称得上是一个大山寨了。雨集村是公社管委会驻地，雨集大队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家也在这个村里。可以说是公社、大队的政治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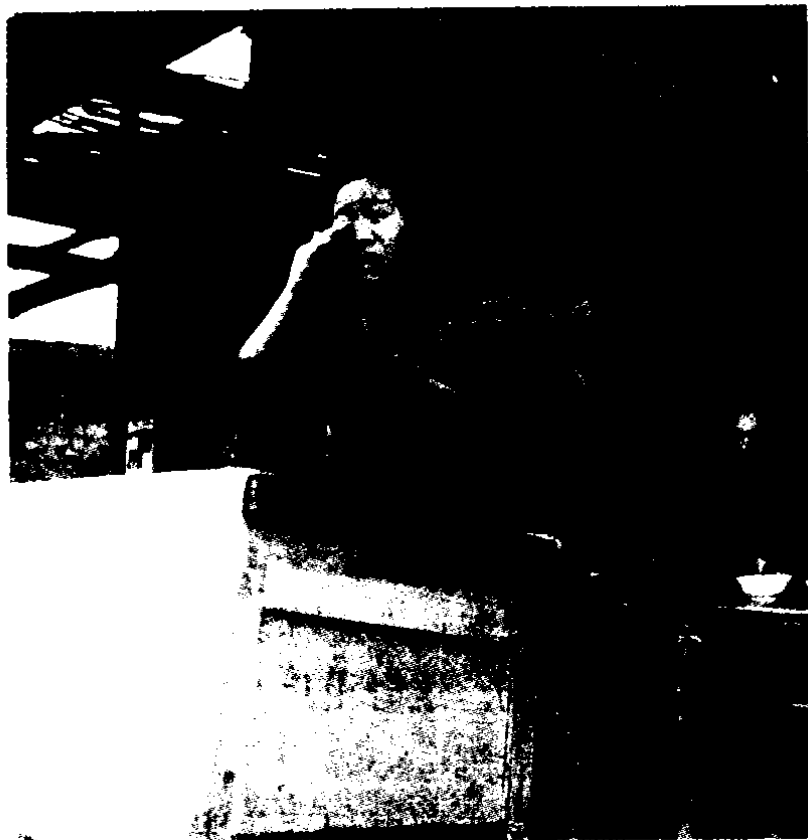
据当年简报载：“会场设在雨集村子的中央”，“9 时左右，群众就进入会场，这时由民兵小组组成的纠察队维持会场秩序，保证大会的安全”。

雨集大队党支部书记罗德明（布依族）和雨集生产队副队长



贫协主席范仲香在“斗争”罗德明。（马大正摄于1965年1月3日）

贫农黄永珍在“控诉”时痛哭。（马大正 摄于1965年1月3日）



贫农车名益在评审富农分子。
(马大正 摄于 1965 年 1 月 21 日)

马昌伦（汉族）是斗争对象。大会的主持者是几天前在“四清”工作队支持下刚成立的贫下中农协会筹委会。也就是说，是贫协“夺”党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的“权”。



从照片中林立的手臂，倒真似《简报》所

描述：“贫下中农和其他农民，以排山倒海之势，斗争了蜕化变质分子地富代理人罗德明及其亲信、帮凶马昌伦。人们一致欢呼打了一个大胜仗。”

挨斗者罗德明是一位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雇农，解放后翻了身，入了党，当上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他的经历在 50 年代中国农村是属于翻身掌权一代农民的典型，依他各方面条件是符合当时的阶级观点和路线标准要求的。从当时收集到的揭发材料看，罗德明的主要“罪行”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与地富分子划不清界线，诸如招呼人帮同村地富家庭盖房；另一类是工作作风粗暴、生硬，且大多发生在大跃进期间，经济上确有公私不分或以公为私的毛病。照片中处在被斗位置的罗德明内心在想什么？不好揣测，不过最大的可能是，此时此刻他什么也来不及想。被斗以后，他是属于“低头认罪”，态度较好的一类。所以在运动后期，他只是被罢了官（其实斗争会上官位已被“夺”了），党籍还是保留了。记得工作队离村前夕，我们到他家造访，罗德明含

着热泪口口声声：“毛主席救了我”，“工作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以为是出自真诚的，也曾为之大大地感动了一番。

范仲香、黄永珍两位同志都是工作队进村“扎根”后培养的积极分子，已是贫协主席的范仲香当然理直气壮，他正在历数罗德明与本村四类分子敌我不清的罪行，而黄永珍的痛哭，我记得是由这么一件往事引发的，在大跃进时黄永珍产后未满月，大队里就让她下地干活，下命令者当然是罗德明。运动后期，黄永珍入了党，还当上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评审四类分子是对敌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雨集生产队在土改划定成份时，有地主3户、破产地主1户、富农1户。到“四清”运动开始这5户共有男女老少31人。他们的生活水平，除富农李绍光因家中劳力多，在队里称得上“富裕”外，其余几户与全队其他成份的大多数家庭生活水平不相上下。当时雨集生产队每天一个工分，每一工分折合人民币是0.012元。即便在60年代，也实实在在可以算得上是贫困山区！车名益本来就是雇农，工作队培养的积极分子，此时已是贫协副主席、民兵连长，批判富农分子，更是大有泰山压顶的气势。

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1963年至1965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场夺权斗争是“四清”运动中无数次夺权斗争的极平凡普通的一场，无论夺权斗争组织者多么真诚，夺权双方的昂扬与沮丧都逃脱不了历史大背景的制约。虽然历史已翻过了一页，但几张老照片却可唤起人们对历史的回忆，对历史的反思。

·旧事重温·

黑 龙 江 1969

罗以民

往事如烟。然对我而言，艰苦的“知青岁月”却是一辈子刻骨铭心的。

1969年初，中国的“文革”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然而3月2日，黑龙江省珍宝岛上一阵激烈的枪声，迅速把全国“工农兵学商”的视线都转了过去，似乎中苏大战一触即发。

仅仅过了4天，1969年的3月6日，杭州的2000多名热血青年便登上了一趟硬座车，长驱5000里，奔赴黑龙江前线。

出发前几天，我同班的10名男同学在校门口合影留念（图①，前排右一为笔者）。我当时是杭州第一中学高一年的学生。杭州一中是一所有近百年历史的名牌中学，校址是清代的贡院，鲁迅、李叔同、夏丏尊等都曾在该校执教。这座大门十多年前已被拆重建，“人去门非”了。

3月6日的出发是悲壮的。送行的父母亲朋把杭州火车站挤得水泄不通，车上车下哭声一片。父亲把他的照相机慷慨地给了我，而以前他是不准我碰的。可惜当时太穷，买不起闪光灯，否则可以抢拍下许多宝贵的镜头。

火车终于启动。哭声和抽泣终于停止。十几分钟后，不知是哪一节车厢带头唱起了苏联的《共青团之歌》，于是所有的车厢都跟着唱了起来，似乎这一列车全部是中国的“青年近卫军”。

从这一刻，我知道我成为大人了，我踏上了社会。那一年，我20岁。



图①

当时天天喊着“打倒苏修”的中国青年居然最爱唱的是四五十年代的苏联歌曲。保尔·柯察金感染了几代中国人。我们就是唱着苏联歌曲奔赴前线准备去跟苏联人打仗的。

火车到了福利屯，算是到了终点，全体下车。每个同学都领到一套黄棉衣和一顶狗皮帽。狗皮帽很暖和，在黑龙江零下30度的严寒中没有一顶好帽子是无法生存的。但是有不少狗皮帽很难看，全白、全黑色的很少，大部分是花狗皮的。女同学们一般都爱漂亮，于是挑帽子就颇费周折。图②是（左起）王英英、曹爱平、王爱华3位女同学1969年在同江县城照相馆的合影。她们头上戴的狗皮帽也许是当年最漂亮的3顶。

我和140多位同学被分配到黑龙江同江县三村公社三村大队当社员。三村大队距县城18公里，但距黑龙江（界河）仅3公里，当时属于最前线，我为此十分自豪。当时，同江县（今同江市）全县人口仅2万多人，全县18岁以上人员均发给“边境居民证”。

刚到三村时没有集体宿舍，女同学们被分配到老社员家住，



图②

而男同学则住在生产队队部的马号里。开始的两个月，男同学们饱受了跳蚤侵扰。5月份，北方的春天来了，老社员们开始帮我们造宿舍。这些屋子泥巴墙草顶。第一年冬天，新房子没有糊严实，怎么烧也烧不热，晚上室内温度常至零下，睡在火炕上头冻得慌，还得戴上狗皮帽。给父母写信，写着写着钢笔里的墨水也被冻住，只能哈几口热气暖一下笔再写。可信中从来不说那儿女苦，生怕父母难过。

图③是我（左一）和两位同学在知青屋前的合影。中间是劳正棵。右一是徐新民，那天他刚收工归来。他很能吃苦，裤子破得两只膝盖都露了出来。徐新民是一位红军老干部的儿子。

到了三村没几天，我就参加了村里的武装基干民兵连。第一次发给我的枪是苏制的步骑枪（“二战”时使用的），另外装备30发子弹和4颗手榴弹。这种“老爷”步枪虽然射速比自动步枪慢，但枪管长，子弹装药多，因此弹道低伸，射击精度很高。我曾用此步枪射击200米外飞速奔跑的狍子，首发命中。图④，



图③

我手中的就是这种步骑枪。当年我们的枪就放在家里，劳动归来，常自觉到雪地里去训练，枪法都不错。

我们村前黑龙江中我方一侧有一个长约 18 公里大岛叫克巴亮子，比珍宝岛的面积要大几十倍。当地人管打鱼人下江临时住的地方叫“亮子”，我想这“亮子”也就是“晾鱼网”的地方吧。在 1969 年之

前，三村的民兵就与登岛的苏军多次发生过冲突。1969 年发了枪，县里便指示三村派了 20 多个武装民兵带一挺机枪上岛日夜放哨，监视苏军动静，白天则以打鱼为掩护。我便在其中。

当时苏军巡江使用的是高速汽艇和炮艇，而我们民兵巡逻用的是生产队里的木质平底渔船。

图⑤，笔者正在划船。两人一只船，分前后棹，站立划行。我们经一个月的艰苦训练，驾船技术几乎与老社员不相上下。这种小船自重很轻，如两人配合默契，划行的速度也是很快的，因为前后棹可以同时划水、挡水，故小船急转弯很灵活。这一点是小木船与炮艇周旋时的唯一优势。

1969 年 7 月 8 日凌晨，距克巴亮子 60 公里外的同江县八岔岛又发生了一场战斗。我国驻岛民兵击沉苏方一艘入侵的巡逻艇，并生擒一人后迅速撤离了该岛。苏军当天下午即出动了十几艘炮艇，在十几架飞机的掩护下，公然派出数百名武装士兵登上八岔岛搜索苏方的被俘人员，直至深夜。苏军最后纵火报复，将全岛

树木烧光。1969年7月9日的《人民日报》，登载了我外交部的强烈抗议。

可当时因为民兵哨所没有电话机，我们居然对这样的重大事件全然不知。我们是在第二天早晨才接到通知全部撤回的。

7月8日上午，我和同学王祖荣仍然划船下江巡逻。那天我俩带了2支步枪、8颗手榴弹和1颗反坦克手雷。7月6日，有同班同学从邻近的富锦县来看我们，说他们那儿苦极了，已3个月没有吃到肉了。我俩便想顺便打几条鱼回去给他们解解馋。小船谨慎地沿着主航道我方一侧作业，打了好几网都是空的，最后才好不容易打到几条大鲤鱼。

正在这时，江对面飞驶过来一艘苏军炮艇，我们也不加理会，依然慢条斯理地收网。突然这艘炮艇气势汹汹地闯入我方水域，直向我们的小船扑来。我和王祖荣不约而同地把手榴弹和手雷都从船舱舱板下拿了出来。我在前棹，飞快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手雷引信，把平时分装的手雷组合好。我又把4颗手榴弹盖全部拧掉，2颗插在腰间，2颗拉出拉火环，搁在舱板上，步枪里的5发子弹是早就压好了的。我对王祖荣说：“如果炮艇敢停船抓人，等它一靠近，我们就突然扔手雷，再加一顿手榴弹，把它打瘫痪，如果咱们的手雷没打准，就蹬翻小船，跳水游回去。”

当时小船离我方岸边仅300米，江面约宽1000米。我们都知道苏方的炮艇装甲并不厚，前后配两挺14.5毫米的双管高射机枪，仅有七八个人，一颗反坦克手雷击中甲板，再补几颗手榴弹，它就会丧失战斗力，说不定我们还可以抓到俘虏。我方民兵下江从来没有暴露过带有武器，攻其不备，是有可能得手的。但攻击失败，则可能遭敌高射机枪射击。

苏联炮艇很快逼近了我们。我俩迅速掉转船头迎着大浪，与炮艇周旋。炮艇连转了数圈，小船只是在原地不断地掉头，船头总是朝向炮艇。如果小船船身与浪平行便会立刻翻掉。我看炮艇越



图④

靠越近,便右手扔掉了一只前棹,举起了手雷。那手雷约 800 克重,平时在陆地上助跑最远也不过扔 20 米,可此刻是在船上。炮艇离小船还有 40 米,够不上,真急死人。

炮艇上的苏军士兵似乎没有多少战斗准备,前后高射机枪的枪衣也没脱,两个士兵甚至还光着上身。艇首站着一个军官,手里提着一只小铁锚,看来他也是想在靠近我船时将铁锚扔上小船把我们拖走。以往他们曾多次用

这样的办法来抓中国人。

他的铁锚比我的手雷重得多,他需要靠得更近。

突然,那个军官看见了我手里的手雷,立刻喊了一声扭头就往船舱里跑,那两个光膀子的士兵也连滚带爬地钻进了船舱。那炮艇立刻一溜烟跑远了。

我和王祖荣强压着两颗狂跳的心,还故作镇静地把网理了一下,收拾好了,才划船返回自己的岸边。附近二村边防站观察所的高倍望远镜把这一切看得很清楚。

返回途中,当我俯首一看自己脚下的时候,顿时惊呆了:两颗横躺在舱板上的手榴弹拉火环全都被甩得直直的,如果我在混乱中踩住了拉火环,手榴弹在颠簸中再来回一滚,岂不就在自己脚下爆炸了吗?我只觉背上直冒冷气。我立刻停船,也不敢跟王祖荣说,

只是将拉火环小心翼翼地塞进手榴弹柄，拧上盖子，这才松了口气。

一个多月后，县里召开大会，宣布了黑龙江省军区合江军分区给我的“通令嘉奖”，县里还给我评了一个模范。

那次大会我没去参加，因我仍在克巴亮子值勤。奖状是村民兵副连长代我领的。军分区奖给我一斤上海产的全毛毛线。这斤毛线后来打成毛衣，一直穿到今天。虽然多次拆洗，但



图⑤

一直舍不得扔掉。全家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那是用命换来的。

1969年，是插队最苦的一年，但也是最锻炼人的一年。这年冬天，上级命令严加战备，严防苏联全面进攻。黑龙江结了冰，苏联的坦克几分钟就能冲过江来。一天，县民兵武装独立营全部拉出去野营训练。我和俞志华编在一班，他任班长，我为班副。按照规定，副班长指挥一个战斗小组，行军时走在全班的末尾。但俞志华认为原来的机枪手军事素质太差，硬要我来担任，让我行军时紧跟在他的身后。他要求一旦发生情况，机枪一定要在30秒内就能发挥火力。我便扛着那挺苏制德普式轻机枪（弹盘里装满了实弹，全重17斤半），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在茫茫的雪原上走了7天。野地里雪深齐膝，深一脚，浅一脚，一天仅能走25公里。晚上—看，脚上还磨出了水泡。饿了，啃几口冻得梆硬的死面饼，渴了